

双柏文史资选辑

第 二 期

政协双柏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印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

目 录

1. 关于征粮剿匪斗争的回忆.....钱定洋
2. 忆李正东、李云烈士在被害前.....李嘉喜口述、刘龙仁记录整理
3. 虎口脱险 剿匪除害.....杨韦章同志回忆片段
4. 解放前遭匪抢的回忆.....李嘉喜口述、刘龙仁记录整理

关于征粮剿匪斗争的回忆

钱 定 洋

征粮剿匪是双柏县一段光辉的斗争史，当时我作为双柏人民的一员，参加这场斗争，现在回忆起来，令人记忆犹新。

土匪暴乱的必然性

解放战争胜利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国民党反动统治垮了台，全国各地建立了民主政权，这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上引起不同的反响。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斗争还只是刚开始，而有些人认为胜利了，太平了……针对这些想法，各级领导组织广大干部学习讨论，分析形势，统一认识。从我个人来说，通过学习和思考，提高了对当时形势的认识。特别是一些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论著，给予我很大启发，使我更清楚地懂得：我们手中的政权，是从旧政权脱胎而来的，它从伤害人民的工具变成为人民谋利益的，这就从根本上牵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。南北干部会师后，由初期的征收平均税进一步实行“累进征粮”，正如中央指出：这是“对新区的地主阶级先开第一刀”，这又从经济上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利益，于是以征粮为导火线，发生了一九五〇年初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暴乱。从双柏的角度来看，当时暴乱的祸根就是“冒牌”，他们为了趁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大捞一把，曾冒充“红军”聚众去“解放”楚雄，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，失败后缩回双柏，各霸一方，扰害乡邻，并互相联络，伺机出山大捞横财。不料形势发展惊破了他们的美梦，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征粮工作的开展，冒牌头目的利益受威胁，就要迫不及待勾结国民党特务，

裹胁群众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扑。这还在他们临逃走时就安置亲信，麦地新冒牌大队长杨秀生的兄弟在逃往武定保安团后，曾写信给当时的伪乡长尹伟仁说：“我们还要回来的！”类似写信回乡的还有许多。这些情况决定了土匪暴乱的必然性。这是一场阶级较量，是政治暴乱，是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。

土匪暴乱的情况

一九五〇年二月末三月初，冒牌副支队长姚兴崇派人从武定送一封信来双柏交给我，大意是说：他们以前在双柏闹了些对不起地方父老的事，现在想明白了，要为地方父老做点事——把以前用双柏人民血汗钱买的武器（枪弹）运回双柏，不交给武定，因此要我们双柏县人民政府给他们一个运送通行证……我当时就看穿了他们的阴谋，当即要来的人回去转告姚兴崇，他们有悔过之意，双柏人民表示欢迎，但武器就不必运回双柏了，若双柏需要，自会派人来运，若等不得，可交给当地人民政府或解放军部队。打发送信人走后，我们把情况汇报给地委，接着便听说姚兴崇还是把武器起运回来，就立即由公安部门出面在禄丰杨家庄把武器截住了。此事过后，许多过去逃出去的人都有恃无恐地跑回双柏来，这些迹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接着，上级也向各地打了招呼：“西南地区有土匪暴乱的可能。”省地委也相继通知：“要集中干部，组成武装工作队下乡征粮。”县委及时传达贯彻，并报经上级批准，补充了武器弹药，分送下乡。与此同时，县领导分头下乡，我到庆和（大庄）乡、崇德（法裱）、仁德（新街）乡，老胡（廷祥）和刘建国到妥甸、龙田（艾尼山独田）乡，传达贯彻上级有

关通知精神，在县领导会议上，我还提出要借征粮之机，把妥甸李光汉、李保和等地霸头子抓起来，镇一下全县欲动之匪。会议后，我们就按分区的地区下乡巡查，每到一个村，都要了解征粮情况及人们的反映，据普遍反映，粮税越来越难收了，谣言也多起来了，有的谣传：征这些粮是要送给苏联，还说在杨家庄停满了拉粮的车，等等。一贯道等特务机构也趁机利用封建迷信放出“刮黑风，下黑雨，地上只留一颗米”、“一个蛤蟆三斤半，共产党的江山只有三年半……”等，真是妖风四起，山雨欲来。

一天下午，我到兴隆乡大黑泥村，平时见到我总是毕恭毕敬的恶霸地主杨学光，这次一反常态，见到我显见不屑一顾的神情，在吃晚饭时还有人到我们周围游转，看到我们很警觉，就没有动手。吃完饭后我们又到村里转了一阵，然后连夜到了雨龙，遇到伪镇长贺显昌，他也很反常，淘淘不绝问这问那，探我们的行踪。第二天到法裱，感到事情有些不妙，就改变了^进新街的计划，派人去把那里的工作同志通知到法裱来，集中传达省、地委有关指示，本来打算不让他们再下去，但当时征粮工作很紧，又没有请示县委，因此只好让他们再下去，但要求他们集中在乡上等待武器送到后再下村。开完会后，已是下午两点多钟，我们又立即到了大庄，更奇怪的是遇到熟人都远远避开我们（到后来抓住土匪首审讯中供认那一次就准备抓我，但看到我们有戒备，没敢动手），到了乡公所，我们马上召集工作干部开会传达上级指示，会后与杨彩南（乡长）住在一屋，做他的工作直到深夜。第二天，我们又前往妥甸，打算与胡廷祥他们会合，研究一下，结果没有会到，就立即赶回县城。

回到县城，正逢街天秩序不同往常，并听说“子午街出事了”，我立

刻意识到是匪乱发生了。就派黄希斌同志组织一支小分队，火速到子午街猛冲一下，救出工作同志后马上撤回县城，我们立即着手县城的防卫工作。黄希斌他们冲到子午街，土匪吓跑了，他们救出了被关着的工作同志后赶回县城。

老胡他们在我们回城后不久就到妥甸，听到杨栋才报告土匪暴乱的消息后，召集乡绅富户开会，结果到会者无几，就去把李光汉抓起来，李保和闻风逃脱，于是将李光汉押着游街，并准备押往格拉游乡，这时，王文俊同志立即从菁口跑到妥甸报告，土匪把菁口的征粮干部抓起来了，他是奋力冲杀出来的。于是，胡廷祥他们带着队伍到菁口救出了工作干部后，傍晚回到县城。我把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，他们也把以上情况告诉我。

县城保卫战

我们回到县城交换了情况，第二天一早召开会议，布置县城的防卫工作。县委仔细分析了情况（包括县城的地形，城内的武装力量、可能出现的问题等），确定了统一指挥，重点把守，不到万不得已不撤退的方针，组成县城防卫指挥部，设在制高点“吕组阁”，派得力的人带精兵死守城西门外的高地（回子山），因为那个山头俯瞰县城，重机枪可射击城中任何一个位置，另外，每个城缺口都派人把守，并规定了联络口令，同时做好居民的工作，以保证城内秩序安定。会上，我还提出鄂嘉可能还未暴乱，应派人火速送信去通知他们集中工作干部，兼程赶回县城。会上当即由我执笔写好信，因怕信被中途截去伪造，就没有用人民政府印章，由我和老胡签名，老胡的名也由我代签，可代签时我无意中将“廷”字错写成“庭”，

结果信送到鄂嘉，林介吾、江巨川他们接信看后一无印章，又有错字，就认为是伪造的，根本不可能发生土匪暴动，于是打发送信人去吃饭，到杨世忠家去了，外面土匪暴乱的消息反而引起鄂嘉赵元功的注意，立即暴乱，把全体工作人员的武器缴了，被分散关押起来。

忆李正东、李云烈士在被害前

一九五〇年，双柏迎了解放，但是恶霸土匪、地主老财不甘心失败，发动了暴乱。为了保卫人民的江山，在双柏县牺牲了很多好同志，李正东、李云两位烈士在牺牲前夕受尽折磨、宁死不屈的精神感人至深。

一九五〇年农历三月十七日，我从田里回来，遇到工作队的胡德渊，他和我到家里吃了晚饭，便叫着我到区公所大门外开征粮会。会上分配了征粮工作的具体任务，因我不识字，安排我去称粮。这时，李保和（伪保长）带着五个人忽然来到会场，开会的人一看到这个土霸王的神情，就陆续退去了。就这样，征粮会因他们的到来而提前散会了。

第二天，胡德渊同志又到河尾开会去了，胡廷祥同志带着一些战士来到妥甸，突然听到菁口土匪反动的消息，就带人去打散土匪，救出了几个工作干部，他当晚回到妥甸后又去麦地新。

十九日晚，公安局张明正同志带领几个公安队员来接胡德渊等同志，正好遇到我去挑水，就问我：“李大哥，胡队长在哪里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可能在保公所。”他们要我去把胡队长找来。我到保公所一看，只见胡队长在楼上弹弦子，在楼口下有个叫李如方的保丁拿着枪在暗中监视他，于是我就大声说：“胡队长，胡县委找你。”保丁听见是胡县委找，就没敢阻拦，胡同志才随我下楼。然后跟公安队员回城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没有起床，杨天和、苏汝嘉（伪保长、地主）他们就带些人把我团团围住，然后爬上房顶拆开瓦片叫我开门，要我把胡队长交出来，我说：“胡队长昨晚就跟公安队回县城去了。”他们无奈地说：

“啊呀，太可惜了！”然后走了。

就在这天中午，李云同志从旧哨被抓到妥甸，在区公所大门外被土匪脱光了衣服鞋子，审问扭打了一天，要他承认征粮是错的，可他坚决不屈服。那些土匪就往他嘴里塞猪食，还用枪筒往嘴上冲，牙齿被冲掉了几颗，满嘴是血。那些土匪打累了，就把李云绑在门外石狮子上

“示众”，然后吃饭去了。我看到这情形，就动了侧隐之心，悄悄回家拿了两个粑粑和一块红糖给他吃，但牙被冲掉了，无法吃东西，我只好喂他一点糖，让他含着解饥。这时，土匪们吃完饭来了，要把李云送到麦地新去，临走时，我看见他赤脚难行，就买了双鞋给他穿，土匪见了大声喊不准穿，我只好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还是给他穿上走吧，他走不动也是拖累你们。”于是他们才准他穿上草鞋，被押着向茶叶菁走去。李云同志回过头来，含着眼泪向我无声地告别了！后来他被带到麦地新，受尽毒打，在押回妥甸途中，被杀害于仙人洞河边。

就在李云被带走后不久，李正东又被从六合带到妥甸。送走李云我就回家吃饭，饭后在门口吸烟筒，只听见几个人从保公所那边又笑又说地走过来，说：“呵，从来不曾见过开水烫人，李正东在保公所被开水烫得跳得多高高！”我赶忙放下烟筒跑去一看，只见李正东被绑在仓库柱子上，对面还关着李树琼（征粮工作队），我到李正东面前，只见他疼得满头大汗，但咬紧牙关一声不哼，我拉起他身上的那件小毛线挂一看，浑身脱了一层皮，我忍不住向走过来的李世正问：“是哪个这么搞的？”他告诉我说是李保初（伪保长），我见李世正手里端着一灯香油，就求他把油给了我，给李正东擦在身上，李树琼在对面提醒我说：“洋碱

（肥皂）好，擦洋碱好。”我正准备出去找上一点，突然听见杨天和在楼上大声喊：“是谁给李正东擦油，把他抓起来。”我一听就急忙跑出来，趁天黑一口气跑到破窑（现麻栗树村）李广福家躲了一夜，第二天听说很多人都去攻打县城去了，我才回到妥甸。刚到家，保长李世相就派人把我叫去骂了一顿，然后说：“现在有三条路任你选，一是出四十套碗筷，二是挑一公石米到窝碑，三是把你关到马厩里等攻城回来再发落。”我选择了出碗筷一条，回家将所有碗筷收笼，又去借添了几套，才勉强混过了这一关。后来听说，就在我逃跑的第二天，李正东被他们押到茶叶菁坡头杀害了。

现在，烈士光荣牺牲已经三十多年了，但他们为革命、为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，永远教育着双柏人民，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李嘉喜 口述
刘龙仁 记录整理

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

虎口脱险，剿匪除害

杨韦章同志回忆片断

(根据记录整理)

每个人大概都会这样，凡是一生中遇到重要的事情，都会记得很牢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提起五〇年土匪暴乱中遇险那一段往事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那是双柏县刚解放以后，人民政权虽已建立起来，但一切条件都很差，社会上也还比较乱，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，迎接南下的同志，我们一些青年相约，积极参加县城中迎接南下同志的准备工作。一九五〇年二月中旬，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来到了双柏，受到县城群众和干部们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，而后又举行了联欢晚会，唱歌跳舞、扭秧歌，不久，全县干部集中到妥甸开大会，主要是布署开展征粮工作，组织征粮工作队，全县当时有十一个乡镇，差不多都派了征粮工作队，我当时分在新鲁乡（现桂花井、麦地新、大敌鲁、罗绍、井口等乡）工作队，李应任队长，王文俊任付队长。工作队下乡后，立即开展征粮工作，按田累进，田多多征、田少少征，无田不征。这样，征粮的主要对象就集中在少数地主大户，由此为引线，发生了五〇年三月的土匪暴乱。

一、发现匪情

记得那是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晚饭后，天气很闷热，我穿了点衬衣短裤从三保（罗绍）保公所出来解便，在大门外看见几个人拿着刀枪在

转，当我回到院内时，伪乡长尹华仁走来对我说：“小杨同志，河西、玉溪漫上来一股，要反动了。”边说边走。来到正屋坐下，他又问我：“你们收的累进粮真是非交不行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政府规定的，一定要交的。”说着，他们就想对我动手，我灵机一动，把烟筒拿在手中边摇边往厨房走去，装做去换烟筒水，他们认为我已是笼中之鸟，也没人跟去。我一进厨房，就放下烟筒从窗子里跳到后院，再爬上屋面向村外猛跑。他们见我走后不回，就立即带人到村外四面堵截，我凭路熟冲出村子，向一个小山头猛跑，来到小山背面，有一片秧田，我喘得喉头冒烟，就坐下喘口气并把身上装着的文件及其他东西埋进泥水里，然后冲上一个山头，直奔乡公所。来到大敌鲁河，月亮已升上来了，突然，不远处走来一支队伍，我急忙蹲到路下的树丛中观察，虽然看不清人，但全副武装，足足有十八人，未弄清虚实，我不敢出声，待他们走后，我急忙来到大敌鲁村，问了村口几位打豆渣的妇女，才知我刚才遇到的是县公安队，又问了李应在何处，他们说在村里，可到乡公所一看，空无一人，当我走出大门时，遇到杨条元（乡丁），他说“人都去参加反动了。”我一听更觉得不妙，一口气跑到麦地新保公所，一看，李应正在审问杨以生（地主），要他交粮。我用手势将李应叫出门外，将我所遇所知的情况详细汇报给他。于是两人立即赶回乡公所，将刚发来的四支枪及子弹背到身上，我建议马上回城，李应说明天是小新街，要借机向群众宣传征粮，说服群众不要参加闹匪。于是连夜向小新街出发，叫杨条元领路，谁知杨条元欺我们人地生疏，故意领着我们在山沟里转，我看这情形，用枪口对准他，若再不老实就打死你，这才走上正路。第二

天天刚亮，我们来到小新街对面的山头，又看见乡公所出来一些人，还挑着枪，仔细一看，是县公安队的。看这情形，我们决定立即回县城汇报。

二、虎口脱险

我与李应两人背着四条枪，四百多发子弹向县城猛赶，途中又遇到宋陶之、杨智仁，每人发给他们一支枪，一行四人来到妥稍。当我们快进村时，苏子同等带着一群人从后面赶来，我们立即子弹上膛喝问他们是什么人，他们看见我们武器好，又有准备，虽人多，但不敢妄动，便诡称是来找牛的，向两边山上走去了。进到妥稍村，我们又渴又饿，决定吃顿饭再走，便来到村头杨家禄家，要他给我们煮点饭吃，谁知他故意拖延时间，让土匪把房前院后包围好，才将饭菜端上桌，并悄悄将我们的枪拿走了，当我们刚端起饭碗，刚才找牛的那伙人就拿着刀枪扑进门来，我们立刻意识到中计了，于是顺手拎起板凳，边打边往外冲，怎奈寡不敌众，被土匪按翻在地，李应也被土匪打倒在地，有一个土匪用刀向李应脖子砍去，可巧这个土匪慌乱中刀背朝下砍，没砍伤，当他翻转刀口再砍时，李应猛力挣起冲出大门，在大门口又被堵在那里的土匪砍在嘴唇上一刀，但他忍痛冲出村外，跑进树林，土匪还一个劲向他放枪。我和杨、宋二人被捆绑起来。后来，他们说“只杀外地人，不杀本地人”，把杨、宋二人放了，而我，说是我与李应串通一气，帮他逃跑，叫杨中正和苏家宝把我拉出去枪决，这时，伪乡长尹伟仁与我有点远亲，就保了我。于是把我押到罗绍关押，直到攻城失败后才放了我。

三、参加剿匪

我回到县城后，听了县城保卫战的一些情况，看到土匪攻城时留下的累累弹痕，再想想自己的遭遇，更增加了对这些反动派的仇恨，于是就又参加去剿匪，由钱定洋同志带领，昼宿夜行，先到妥甸抓捕李保和、李保华两匪首，李保初逃跑了，我们查封了他的家。然后到独田接回被关押的田一、熊元久、王世兴、张群新四位工作同志，然后又到新庄捉拿了匪首赵得儒，到大黑泥捉拿杨学光，杨学光潜逃了，却意外地捉住匪首李光汉，接着又到法裱捉拿匪首苏家相、郭红才等，再后就集中精力捉拿大匪首苏绍。在这当中，我们始终坚持“军事追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”的方针，追捕首恶，争取匪众投诚登记，几个月后，大部分土匪辄捕的抓捕，投诚的投诚，匪首也大部分落网，少数顽匪也如漏网之鱼，难逃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。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匪首的抓捕中，郭庆虎、杨栋才、廖德祥等同志，勇敢顽强，令人佩服，与他们一同去捉拿匪首，根本不感到害怕。如在新庄捉匪首赵德儒，我们四人先装着去找牛的，到他家找水喝，匪首是很警觉的，我们一进去，他及其三个狗腿就想动手，稍有疏忽就要吃亏。还有在捉拿苏家相时，郭庆虎与匪首扭做一团，在地上翻来复去搏斗了好一阵，弄得我们在旁有力帮不上，最后还是战胜了匪首苏家相，并击中妄图顽抗的匪首腹部，使匪首苏家相受到应得的下场。

四、土匪司令的下场

端阳节前，我们经过反复侦察，探准土匪头子苏绍隐藏在马当郎村。

于是决定趁过节之机抓捕这个顽抗到底的匪首。农历五月四日夜间，下了一场大雨水涨路滑，我们由钱县长带领，还有解放军一个排配合，天亮前就整队出发，当我们踏着泥泞到达马马当郎村时，太阳已冒山了，我们先在村口比较开阔的小山丘上架起机枪，堵住路口，然后钱定洋同志亲自带着公安队员直扑村西头那幢楼房。这时，全村的狗都狂吠起来，突然看见匪首苏绍光着上身从窗口向外窥探，当他发现是公安队捉拿时，急忙逃出楼房，一边穿衣一边往山冲里跑，手里还拿了支推轮枪。我们一看见匪首还想顽抗，就拉动机枪栓，准备给他一梭子，但又想起组织上的布置，这个大匪首要尽量抓活的，并看见匪首后有紧追的公安队员，怕误伤自己的同志，怎么办？如果让苏绍跑进冲中就很难抓捕了。正在危急之际，钱定洋同志心生一计，大声高喊：“同志们注意了，匪首苏绍进山冲来了，你们山上和冲里的同志堵好，别让他跑了。”其实，我们原计划天亮前包围村子，在被窝里抓匪首，不料泥滑路烂，贻误了时间，再加上我们进村时狗吠声惊醒了匪首，没料到他会这么快逃进山冲，因而冲里根本没有人把守，这是钱定洋同志的计谋，匪首苏绍一听前有埋伏，果然转头往沟下溜去，躲到一块岩石后面。这时，民兵李高和公安队的杨勃然一前一后紧追过去，看到苏绍溜下水沟时留下的泥印，就跟着搜下冲去，突然听到喘息声，抬头一看，苏绍瞪着血红的眼睛举枪向他俩瞄准，李高一急，向后侧一闪身匪首两枪打向杨勃然，一枪打在左胸衣袋内的钢笔套上滑了，第二枪打穿了杨勃然左手，另一名公安队员赶上来，看到苏绍缩进一丛小树，就照准打了一梭子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击穿苏绍的太阳穴，他还挣扎着放了两枪，然后无力地

垂下双手，苟延残喘，这时，又有两位解放军战士冲到，看到顽抗到底的匪首，两支冲锋枪交叉扫射，将苏绍浑身上下打成筛子一般，匪首苏绍恶贯满盈，落得如此下场。

打死匪首苏绍后，我们回村继续搜查，清理战场，当我们来到苏绍住过的房内，只见烟灯（抽洋烟的灯）还点着，被褥狼籍，桌上放着一只已杀好准备过节的鸡，后来又在房后阴沟的涵洞里搜出苏绍的女儿。搜查完后，我们安抚了村里的群众，向他们作了宣传，然后煮了苏绍杀好的鸡，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后，派人把匪首苏绍的尸首抬到大庄示众，大庄几千群众看到匪首恶霸被除，无不欢欣鼓舞，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他们报了仇，雪了恨，消除了祸害。

对解放前遭匪抢的回忆

我叫李嘉喜，是一个退休医生，双柏县妥甸镇人。我一生坎坷，经过无数次离合悲欢，今天，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安度晚年，这福份总是使我想起一些往事。特别是解放前双柏人民遭土匪抢劫的情形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旧社会，人民不但要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，而且还经常遭到土匪的扰害。民国十八年（公元一九二九年）十月十八，横行在易门、双柏、禄丰、楚雄、南华、祥云等几县的大贼头（经济土匪）“铁壳表”带领一千多人来抢妥甸，这群土匪凶残歹毒，抢了财物、家畜，又向各家敲榨钱。还要抢走一些人，强迫为他们挑抢来的东西。我当时只有十三岁，也不幸落入匪手，和我一起被抢走的共四十八人，我们被迫挑着东西跟他们一起，先到小村住扎，第二天到了母鸡窝村，当晚，“铁壳表”一伙，又去抢了羊桥、大涉腰等村子，然后去石井（楚雄哨地）驻扎。一路上，有些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人挑不动，走不动，被拖累垮了，他们就一杀了之，真是杀人不眨眼。到了驻地，每晚都要照例地“收毛子”——捆绑吊打被抓去的人，逼迫答应并代信给家人拿钱去赎人，每个人至少一、两千块银圆，没有钱的就强迫入伙，学说匪话。当时我家连生活都难度，哪里有钱去赎，但被逼之下，我答应到一千多块，后来我老母亲去苦苦哀求，才免于死，被带往麦场梁子（楚雄县属）等贼窝。过了几天，听说国民党政府派一个独立营和卫士队来围剿，我们便被带着到处流窜，东躲西藏，有时也打上一阵。一个多月后，逃脱了追剿。冬月二十四日到了母巴拉岔河

驻扎，第二天一早，土匪内部为争当贼头进行火并，“铁壳表”和三十多个他的亲信，被一个叫方连长的部下打死了。

土匪伙并后，方连长当了贼头，二十五日到萨拉么驻，二十六日到小海子（现中山）开稍（吃晌午），这些土匪以为摆脱了追兵，就把铁壳表遗下的拉七枪拿到村外空放几枪，枪声被来追剿的军队听见，于是就几方包围。当天太阳落山时，土匪与追剿的军队在苏家哨打了起来，激战两天两夜后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这群土匪被打散了。在仗打起来后，我和一些人躲到苏家哨的寺庙里，第二天才逃回妥甸。那次和我一同被抢去的四十八个人，有的被土匪杀害，有的被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乱枪打死，有的下落不明，最后只有四个人活着回来。

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。真是新旧社会两个天。如今，国泰民安，生活安定，世道太平，到了晚年能过上这种好日子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李嘉喜 口述

刘龙仁 记录整理

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